

现代人的失衡与救赎

——读大江健三郎《玛戈王妃裙上的口袋》 □邱雅芬

《玛戈王妃裙上的口袋》是大江健三郎57岁时的作品,首刊于日本《文学界》杂志1992年2月号,译成中文约一万字左右,后收录于讲谈社同年出版的大江短篇小说集《我那时真年轻》。作品显示了大江对“时代”、现代人“灵魂”等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是其反映现代人宗教意识的《燃烧的绿树》三部曲(1993-1995)的先导作品之一。

玛戈王妃(1563-1615),中文又译玛戈王后。当时,法国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矛盾重重,其母凯瑟琳皇太后策划将天主教徒玛格丽特嫁给新教徒纳瓦拉王储亨利,以伺机剿灭亨利及新教势力,玛格丽特成为法国十六世纪宗教战争和宫廷政治的牺牲品,但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盛传玛格丽特是一位放荡堕落的王妃。

在作品中,具有大江分身性质的作家“我”以玛戈王妃的所谓爱欲生活为引子,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情:电视台摄影师篠君结识了在日本打工的菲律宾酒吧女玛丽亚。玛丽亚来日本已经五年,属于非法滞留者。篠君为玛丽亚的生活提供了许多帮助,他以自己的名义为玛丽亚租了公寓。玛丽亚也和玛戈王妃一样爱穿长裙,而且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非常旧式的红皮行李箱”,其真实生涯以及她与主持着一个流动“教会”的菲律宾青年菲尔南德斯之间的亲密关系,使篠君将其与玛戈的形象重叠在一起。玛丽亚最终带着她那神秘的“行李箱”失踪了。时光流逝,篠君为了寻找玛丽亚,也已经离开东京两年,至今杳无音讯。

作品具有明晰的“时代”意识,聚焦了高度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日本人的救赎问题。作品发表于1992年,其中的故事则发生于“两年前后”,即文本内的重要时间段之一是1990年至1992年间。这时期,无论日本还是世界都经历了重要的转折期。1989年1月8日,平成天皇即位,日本结束了漫长的昭和时代,开始进入平成时代。从昭和时代(1926-1989)后期开始,大致在1985年至1991年间,日本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泡沫经济时期,地价股价飞涨,工资收入暴增,劳动力市场人手紧缺。日本人的生活变得奢侈颓废,白领们热衷于各式名牌及奢侈品。各类身份的外国人蜂拥至日本。即便在遥远的日本东北地区也可见菲律宾酒吧女的身影,她们用青春与泪水点缀着日本的夜色。从世界范围看,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冷战结束,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系列事件被解读为资本主义取得了最终胜利,也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是《玛戈王妃裙上的口袋》写作、发表的时代背景,也是大江在作品中多次提及“俄罗斯作家”,而非“苏联作家”的原因所在,因为这里隐喻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然而,物极必反,世事无常。1991年3月,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翌年地价、股价开始下跌模式,日本经济开始转入长期低增长时期。当然,奢靡的生活方式还未受到明显的冲击,物欲享受依然如魔咒般诱惑着人们,直至1995年阪神大地震及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后,泡沫经济破裂的后果才开始显现于生活层面。

大江对玛丽亚的时空环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据篠君为玛丽亚拍摄的录像片的画外音可知,玛丽亚是在1985年前后来日本的,这是日本泡沫经济开启的时间节点,一场物质狂欢的盛宴开始了。一切都成为了“商品”,玛丽亚等非菲律宾姑娘们的青春亦成为商品之一,进入了日本的“物流”渠道,“中小企业主、电视台干部、室内装潢家之类的人物”消费着玛丽亚的青春。这一众男性形象构成了作品的潜文本,隐喻着资本的所向披靡、资本时代人类灵性的丧失以及当代家庭的危机等。玛丽亚租住公寓的所在地“池袋”这一东京都市空间亦值得关注。1978年竣工的池袋“阳光城”高达239米,地表60层,直至1990年东京都厅建成为止,“阳光城”一直是日本最高建筑物,亦是日本经济崛起的象征。城际巴士站等的设置使池袋成为东京的又一交通枢纽,而此处的背街小巷依然保留了大量庶民生活空间。在泡沫经济时代,这里成为东京外国人聚居地之一。

作品篇幅不长,却嵌入了诸多国际色彩,菲律宾姑娘、俄罗斯作家、中国留学生汇集在泡沫经济时期的东京。大江在作品开篇处写道:“我从未专门学习过历史,也不是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小说家。但偶尔会被问及法国十六世纪的一些详细情况。那是因为我曾与同为法国人文主义领域学者的先辈编辑过为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奉献了一生的W先生的著作集。”大江由此将其“时代”意识进行了纵深拓展,

将其对现代人“灵魂”问题的探索上溯至“人性”开始抵抗“神性”的时代。

然而,人性过分张扬的后果显而易见,由人类中心主义引发的环境污染、生物链断裂等生态灾难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现代社会的“失衡”现象比比皆是。男主人公篠君的职业是摄影师,即以观察、观看、记录为职业的人物,却是一个“斜视”者。其“斜视”深刻地隐喻了现代社会的“失衡”。大江作品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形象常常是“斜视”者,《万延元年的足球》中的蜜三郎亦是一位“斜视”者。这些“斜视”者的共通性,即他们同时还怀着深刻的焦虑,亦具有探索者、思索者的一面。仅就文本脉络而言,篠君的大部分焦虑来自于对女性欲望的恐惧,他也因此而离婚。他那“古式的面庞令人想到农民武装起义中被处刑的农民”形象自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农民”所象征的农耕文明已被现代物质文明“处刑”,大江的比喻隐含着深刻的内涵。

篠君与玛丽亚相识后,更加关注女性欲望等问题,他将菲律宾的玛丽亚与法国的玛戈王妃、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的酒吧女串联在一起,感到了深刻的迷茫与不安。日本富良野酒吧女长达十年的杀婴事件是一起真实的刑事案件,可谓女性与母性失衡的典型例证,亦象征了人性的泯灭。这些封闭于私密空间中的恶性事件令整篇作品散发着“僵尸”的恶臭。当然,这也是纸醉金迷的“时代”气息。

从表面上看,作者似乎也暗示了玛丽亚那只“行李箱”散发出的恶臭。玛丽亚的公寓自然也散发着恶臭。那是一间“红绿色植物城堡”般的房间,令“我”联想到“菲律宾魔幻现实主义电影中建在热带丛林中的玩具厂的样子”。从篠君的语汇可知,邻居们投诉了玛丽亚“花瓶水的腐臭味”,但篠君对“我”妻子说玛丽亚的房间:“完全晒不到太阳,只开了一个小窗……因为不打扫房间,所以用花来掩饰气味吧?”可见篠君并不相信花瓶水是气味的源头,他关注的是玛丽亚那只神秘的“行李箱”,而“行李箱”的确是整篇作品的重要道具,它贯穿始终,亦是故事发展的重要推力之一。从一系列引发篠君焦虑的物品:玛戈王妃裙上的“口袋”、两位日本酒吧女房间里的“纸箱”或“箱子”,可以推断篠君怀疑玛丽亚那只“行李箱”中可能也放有“僵尸”般恶臭之物。在作品结尾处,篠君向玛丽亚求婚,并试图扔掉那只行李箱,这导致玛丽亚情绪失控,最终逃离公寓,不知所踪。

“行李箱”象征了玛丽亚的诸多“秘密”,亦是其心灵世界的象征。玛丽亚在篠君为其拍摄的录像片中亦提及了她所经历过的痛苦人生,那也许是失去亲人之痛,也可能是对被骗到日本出卖青春的懊悔。那么,那总是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中,也许装着逝去亲人的相片,以及作为“非法滞留者”的护照等。总之,那是一个“非法滞留”异国者仅有的一方隐秘空间。在令人绝望的痛苦中,菲尔南德斯及其流动教会为玛丽亚阴郁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光,正如她在录像片中所言:“与菲尔南德斯在一起时,可以听到‘救世主’的声音。”这种在灵与肉之间搭建起的“平衡感”是“斜视”抑或“失衡”的篠君等现代日本人无法理解的。那么,玛丽亚的逃离亦是情理中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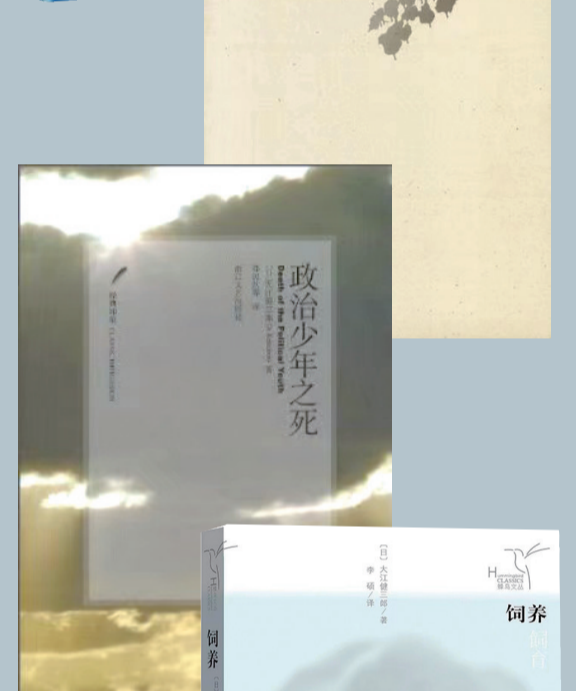
大江借用篠君的摄像机,将玛丽亚的公寓装扮成“红绿色植物城堡”,用“鲜花”隐喻了玛丽亚的灵性之美。正如“菲律宾魔幻现实主义电影中建在热带丛林中的玩具厂的样子”所显示的,虽然鲜花的自然之美已经遭到“现代”工业化浪潮的蛀蚀,已带有明显的滑稽感,却依然顽强地活着。“玛丽亚”之名也令人联想到圣母玛利亚,可见大江还把她当作了跌落红尘的受伤天使。与此相对,“篠君”之名中的“君”是一种敬体,无实质意义,而“篠”的日语发音sino或sinu,与日语“死亡”的读音相近,这或许是他被玛丽亚吸引的真正原因,因为无论如何玛丽亚具有超越死亡者的光环。

大江借用篠君手中的那台摄像机,记录了日本资本主义烂熟期的诸多社会症候,提出了现代人在爱欲与信仰、女性与母性、个人享乐与责任等方面的失衡问题,探索着现代人重拾“灵魂”的可能性。抑或由于大江本人的法国文学专业背景,或受篇幅所限,大江在作品中仅仅展现了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探索路径。东方思想资源的缺失是否会引发新的“失衡”现象呢?这是令笔者感到担忧的。然而,无论如何大江在二十世纪末提出的这些问题意识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思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分会会长)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2023年3月3日)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第五次友好访华期间,特意前往南京访问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与当地研究大屠杀历史的学者们展开了交流。当被问到“日本官兵为何在南京做下如此残暴的行径”之时,大江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他回答道:“这些加害者本来都是普通的国民,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残暴的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不过,倘若我们仔细观察,便可以发现大江早已将其思考诉诸于文字告诉了诸位读者。2007年7月4日,大江在日本《朝日新闻》的专栏中控诉了二战期间驻冲绳地区渡嘉敷岛的第三十二军,他们曾用武力强制岛上居民“集体自决”,大江在揭露日本官兵残暴行径的同时,亦犀利指出残暴的背后是以“顺从”为核心的国民教育,也就是二战前日本的“忠君爱国”教育观。

在接纳中质疑

所谓“忠君爱国”教育观,指的是二战前日本在《教育敕语》指导下所奉行的“天皇至上”教育理念。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后,绝对天皇制政权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稳固政权,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教育敕语》以向国民灌输“天皇至上”教育理念,鼓动他们为国献身;其后,教育更是被纳入至战争的轨道,开始服务于侵略战争。大江出生于1935年,亲身经历了日本二战前的“忠君爱国”教育,年少时期曾视“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战死”为最高人生信仰,在随笔中他如此回忆过往的这段教育经历:

战争期间初等教育——我们是唯一一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年上国民学校,又在战后新体制确立之前毕业的人——所培养的,是绝对天皇制,天皇是神的思想。

其时,为了给少年儿童灌输“天皇是神”的意识,日本政府命令文部省给全国多数学学校下发天皇和皇后的“御真影”以及《教育敕语》的副本,规定学校将这些东西供奉在奉安殿,并定时组织学生朝拜“御真影”、“奉读”《教育敕语》。如此引导下,少年大江的最大心愿就是“为了天皇而上战场”。在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1960)中,大江大致还原了这段经历。小说讲述了1945年日本战败后,主人公“我”从一名军国少年成长为一位民主主义战士的过程,其中,“我”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构成小说的明线,贯穿始终的“迟到”二字则成为了小说的暗线,明暗双线共同架构起大江对日本战前“忠君爱国”教育观的思考。

小说中,“我”的“忠君爱国”教育观受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多重影响。这里所谓的家庭教育主要来自“我”的父亲。父亲信奉国家主义,尽管他已经去世,但他自幼教育“我”说道:“对于战争,没有一个人会迟到。大家都去参战,都去当兵!”这种思想对“我”影响至深。而学校教育指涉女教师等人对“我”实施的各种教诲,女教师时而鼓励我要像拉包尔航空队的战士一样勇敢,时而又讽刺“我”从而激励“我”参战;此外,还多次提醒“我”要好好回忆父亲在世时对“我”的教诲。社会教育则主要来自村长以及村民们的言行举止。村长多次提及如果发生战败,他将在奉安殿的正面前剖腹自尽;而村民们则视奉安殿为贫穷村子的唯一骄傲,将其修建得熠熠生辉。这些举动都显示出奉安殿在他们心中的显赫地位,亦印证了天皇以及《教育敕语》的重要位置。

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影响下,“我”深陷在天皇的幻影之中,一切努力只是“为了天皇而上战场”。但是,随着日本战败,“我”最终迟到了。于是,“我”丧失了所有斗志,站在村长剖腹自尽的奉安殿正面抽泣,而此时奉安殿上菊花图案的金质纹章就好像“暗处窥伺的野兽的眼睛,犀利地注视并威吓着我”。众所周知,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也就是天皇的象征,尽管战败后天皇从神降格为人,却仿佛成为一种缺席的在场,在暗处监视“我”的举动。如此天皇幻影之下,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我”模仿村长为天皇剖腹自尽的样子,毅然决然地将刀子戳在了自己的左上臂。

儿时的大江曾对学校组织学生朝拜“御真影”的行为充满好奇,却因此招来校长的一顿毒打。这使得大江惧怕,亦开始对“天皇至上”的“忠君爱国”教育观产生了质疑。黑古一夫指出,少年时代的大江被迫活在一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中,也就是说,身为军国少年的大江,内心却质疑“御真影”所象征的意义。在与君特·格拉斯的另一封信中,大江说起有个年轻士兵因从天皇军队出逃后遭到宪兵威逼从而羞愧吊死的事,其父母在面对儿子尸体被宪兵践踏时居然没有反抗。可见,在“忠君爱国”教育观的灌输下,士兵及其父母都可以有违“恐惧死亡”的天性。儿时的这些经历带给大江诸多思考,亦使其对之不断产生质疑,其后的大江文学之中,这种质疑更是发展成为一股勇敢的抗衡之力。

在质疑中抗衡

或许是为了表达自己与“忠君爱国”教育观抗衡的决心,在《迟到的青年》之后,大江又相继创作了短篇小说《十七岁》(1961)以及续篇《政治少年之死》(1961)。两部短篇均以一位17岁少年为主人公,前者讲述了这位少年加入皇道派后成为天皇赤子的经历;后者则刻画了其在“忠君爱国”教育观的迷幻下,刺杀反对天皇制的委员长的心路历程。两部小说一经发表,就由于影射日本社会现状而遭到右翼保守势力的威胁,2018年,《政治少年之死》才得以收入至《大江健三郎小说全集》中。

两部小说的时间背景均为1958年。1945年日本战败,其后日本在美国的指导下开始进行民主化改革,象征性天皇制登上历史舞台。新的思想与制度给日本人带来了实惠,同时亦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那批将“天皇至上”视为圭臬的年轻人开始怀疑自我,并逐渐陷入苦闷甚或恐惧之中。占领期结束后,日本在法律上取得了独立,但由于《旧金山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等法律文件,美国得以继续驻扎日本,并在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上继续控制日本。这种背景下,那批年轻人愈发无奈,甚至陷入绝望。《十七岁》中的少年便是这其中的一员,他在经历了价值观上的左摇右摆后,最后加入了皇道派青年组。这个青年组有着铁一样的规则。此时,虽然已是战后,绝对天皇制亦退出历史舞台,但这部铁则不仅要求青年们忠诚与勇敢,还必须服从天皇与国家。这些内容与二战前日本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国民道德方针《教育敕语》如出一辙。

《教育敕语》颁布于1890年,此前,为了实施立宪政治,日本政府试图借助天皇统一民心。为了给国民灌输“天皇至上”的观念,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实施,其中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1890年,日本政府又颁布《教育敕语》,将“克忠克孝、亿兆一心”定位为“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教育敕语》颁行前,明治天皇曾于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对日本军人提出了以“尽忠为本分”与“尚勇武”为核心的五点要求。在这些观念的引导下,日本军人的“忠君爱国”意识日益增强。不难发现,《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谕》有着毫无二致的精神核心,战争期间,两部方针更是一同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思想来源。

细读可知,《十七岁》中皇道派青年组接受的教育正是来自《教育敕语》。在续篇《政治少年之死》中,这位“早晨奉读《教育敕语》,傍晚朝拜御真影”的“忠君爱国”少年,终于在天皇幻影的引导下走上了毁灭之路。临死前,少年听到了曾经最为钟爱的旋律《哦!卡罗》。《哦!卡罗》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一首经典情歌,由美国作曲家尼尔·西达卡创作,歌曲大意是尽管遭到爱人欺骗,也希望和她永不分离。明显,大江通过刻画日本少年对一首美国歌曲的钟爱,既暗示了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思想,也揭示出关系“深远”的日美同盟。

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残暴的人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思考“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残暴的人”。正如大江在上述三部小说中所揭示的那样,《迟到的青年》中的“我”也好,17岁少年也罢,都深陷天皇幻影之中无法自拔。由此可见,二战后的日本虽然已经摆脱绝对天皇制的桎梏,但“天皇至上”的意识形态依然发挥作用,因此,就更别提摆脱对天皇制统领日本的时代了。彼时,为了维护与巩固绝对天皇制,日本在《教育敕语》《军人敕谕》的指导下,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了天皇而上战场”,“为了天皇去死”等“忠君爱国”思想深入人心。他们可以为了效忠天皇而选择自尽,比如《迟到的青年》中的村长,又如从天皇军队出逃的士兵;当然也可以为了效忠天皇而选择变成残暴的人,比如血洗南京城时的日本军,又如逼迫冲绳地区渡嘉敷岛全体居民“集体自决”的第三十二军。而效忠天皇的背后,则是他们自小被灌输的“忠君爱国”教育观。

法国哲人爱尔维修指出:“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在“忠君爱国”教育观的影响下,诸多日本人争先恐后地“为了天皇去死”。大江虽然深深质疑这种教育观,却也不能不承认儿时的自己曾为其倾倒,甚至在剖析自己过往的精神史时表明“天皇陛下万岁”这种思想也许会再度袭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与之进行着抗衡。90年代中后期的大江文学中,这种抗衡开始变得更为明确且直白。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跟随大江健三郎反思日本二战前的教育观

□方蓓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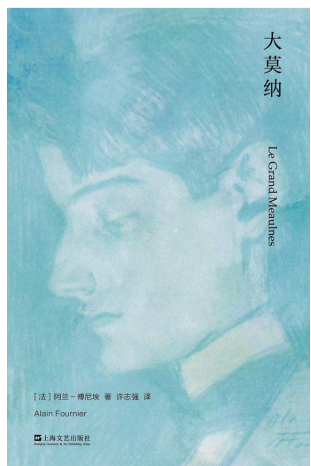
■书讯

阿兰·傅尼埃小说《大莫纳》出版

近期,法国作家阿兰·傅尼埃的长篇成长小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字句工作室联合出版。

小说中,倔强、憨厚的17岁少年莫纳来到乡村学校,成为班上的领袖,人称“大莫纳”。一次偶然迷途中,他来到一个神秘庄园,这里有穿戴奇怪的男女,古老的房子,五花八门的马车,简直是童话中的世界。更令他惊奇的是,这儿是孩子们称王称霸的天下!

在庄园,他见到美貌绝伦的少女伊冯娜,一见倾心。她弟弟弗朗茨正准备举行婚礼,新娘却突然不见,随后,弗朗茨也失踪了。第二天夜里,莫纳离开了庄



此后,莫纳一心想找到消失的庄园和恋人伊冯娜,但是无论

如何也想不出通往庄园的路……

阿兰·傅尼埃(1886-1914),法国小说家,生于法国中部的夏佩尔东吉永,父母都是乡村小学教师。他两次报考巴黎高师失败后,服兵役入伍,退伍后在巴黎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1912年,《新法兰西杂志》连载其小说《大莫纳》,受到文坛好评,获龚古尔奖提名。代表作《大莫纳》,长期以来深受读者喜爱,对法国现代文学影响很大。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留下的创作很少,仅以一部薄薄的作品就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这在名家辈出的法国小说界并不多见。

(世闻)